

马华文学作品集

方修编

7. 散文（战后）

1945—1956

《马华文学作品选》

出版前言

(一)《马华文学作品选》是一套小型的丛书，全套八册，战前（一九一九——四二）及战后（一九四五——五六）各四册——小说、戏剧、诗歌、散文。所选的作品，大都是拙著《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里面分别提到的，目的在方便这两本小书的读者检阅有关的原始作品。所以这几册小型的选本也可以说是上述的《简史》和《初稿》二书的附编，没有任何创意，也少有新的资料，完全是为了一般读者、特别是青少年学生的需要或实用而编辑的。

(二)六十年代后期至七十年代初期，为了配合“马华新文学史”的教课，我曾先后编了两套大型的马华文学作品的选本，由新加坡世界书局出版。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一九一九——一九四二），共十册。另一套是《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共四册。后者原定也是十册的，但因书局改组、主持易人、我个人也不再搞教学工作，终于没有全部编完。要说作为《马华新文学简史》及《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二书的补助读物，这两套大型的选本可能是更理想的。但这两套书本来印数不多，书价一度不太廉宜，不是大多数青少年读者所负担得起的；而且最近坊间存书渐少，已经不易购得了。因而，把《大系》各书重翻一遍，精选一下，出版一套同样属于文学史参考资料性质、书价又比较大众化的小型选本，看来客观上是有需要的。

(三)其实，早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编纂之前，大约是一九六七年初吧，我已为世界书局编过一套小本子的选集——《马华新文学选集》（一九一九——四二）。当时打算编出六册：小说二册，诗歌、戏剧、散文、理论批评各一册。后来由于书局方面决定扩大出版计划，改为编纂《大系》，这套小选集仅出了小说、诗歌、戏剧三种四册，便中止了印行。不消说，那几种已印出的小册子，也早就绝版了。所以，就某种意义而言，现在的这一套《马华文学作品选》，也可以说是前时的《马华新文学选集》的新版与续编。当然，编选工作是从头来过的，书的内容与体制都不相同了。

(四)本丛书所选录的作品，其写作的时代背景或作者的历史贡献，大多分别在《马华新文学简史》和《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谈过了。但为了方便读者，新的选本还是特别增加了“作者简介”和“作品简析”两个项目。前者仅就所知介绍了一点作者的生平，后者略述有关作品的一二特点，有时则作几句注解或评说（这里的“简析”其实也还是“简介”的意思）。读者可从这些资料与《简史》及《初稿》二书彼此参照，互为补充，从而增进对于马华文学史实的认识。至于这两个项目的内容的更进一步充实，那是属于作家辞典的编辑人和文学艺术评赏家的专业了。

(五)本丛书的编辑缘起是十分偶然的。最初是我和董总成员李华联先生在新加坡晤面，聊天的时候，提及独中学生统一考试，近年出现过若干关于马华文学的试题，我说这类题目看似容易，其实是很难答的。因为学生们多数只是看了一两册文学史著，没有机会阅读到原始作品，对于作家作品印象不深，那就必然不够资料来做答案。不像中国的古典文学或现代文学，如李杜的诗，韩柳的散文，鲁迅、巴金、老舍、曹禺诸家的小说或戏剧，几乎随时随地可以买到，大家平日多少有了些接触，那么，答起考题来，拉拉扯扯，总会有些话可以说的。因而，马华文学史方面，至少应该有几册原始

作品的选本作为文学史著的补助读物，否则学生恐怕要视这一类的试题为畏途了。我和李先生闲聊的是关于学生的考试问题，所以不觉对于马华文学部分多说了些话，实际上并不曾准备再来做这种对于我来说已经颇感厌倦了的编辑选本的工作。（我个人的计划倒是花三几年的时间来编写一册六十至七十年代的星马文学小史）没有想到李先生却把我的意见很快地向董总的有关负责人反映上去，而独中统一课程编委会的执行秘书陈清德先生更立刻作出决定，要我来负责这一套选本的编务；其间又派了董总出版小组的爱薇女士出星和我作了一次面谈，初步落实了这个出版计划。爱薇女士也表示出版小组的人员会抓紧排校、印刷等工作，如果交稿方面没有问题，全书八册，肯定可以在二年内陆续出齐。这样一来，我只好搁下个人的写作的小计划，把仅有的一点时间用来配合董总的这一项印书的安排。因此，如果这套小丛书能够顺利的推出，那可完全要归功于李华联先生的热心的促成，陈清德先生的明快的决断，以及爱薇女士等董总出版小组同人的通力合作，这是应该特别说明的。至于我自己，老牛破车，只能勉力而为，追随诸位干劲十足的壮年人的骥尾而已。

方修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新加坡

目次

	出版前言	1
胡愈之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6
依藤	钟灵中学员生殉难记	30
李冰人	过关与“鬼门”	48
	酷刑种种	51
	“族”与“瓜蔓抄”	54
亦蒙	炮火中的洗炼	60
	——星洲学生战时服务团生活	
	回忆片断	
叶冠复	赤道风光	74
	斯人独憔悴	81
宋千金	新年	89
	多余的话	90
光明	街头杂景	92
	麻坡的青年群	96
漂青	尘世浮画	100
萧村	牛车夫	104
	相命先生	110
高云	废庙	116
	箫	118
杏影	忠于现在	124
	谈清静	127

	现实和梦	128
	晴天和笑脸	132
	理想是暴君	136
	友情和爱情	138
	从“动”想起	140
	不安是时代的灵感	142
吴 进	热带三友	144
连士升	越南的隐居	150
	略述左宗棠	156
鲁白野	古城札记	164
	槟榔的岛	167
格 致	巴士工友和五分钱	170
	四角钱与德士司机	173
	笑之前先想一想	176
马 亚	从咖啡想起	182
	《烟火》随笔	184
	生活的水流	185
	童年	187
铮 英	生命的燃爆	190
	老车夫	192
任 宁	一定能够飞起来	198
	隐藏着的伟大	200
	音乐与冰淇淋	206
苗 芒	沉忧的雷	214
	祖国	225
陈 凡	泛论反对黄色文化运动	232
以 今	椰树	244
	迎春散记	246

作者简介

胡愈之，一署沙平，原名胡学愚，浙江上虞县人，是中国的名政论家。一九四〇年杪抵新加坡，任南洋商报主笔兼总编辑，所撰社论为战前马华政论散文中最出色的一批。数年前上海书局出版的《胡愈之作品选》，即为其中一部分文字的结集。沦陷时期胡氏避居苏岛，研究印尼文，著有《印度尼西亚语语法研究》。战后返星办报，除撰写政论外，尚有中篇小说《少年航空兵》的发表。一九四八年三月经港赴华，从事出版及汉字改革工作。八十年代中期逝世。最后刊行的遗著有《南洋杂忆》、《怀逝者》等。

作品简析

这是胡氏战后初期由苏岛返星后向各地文化界及郁达夫亲友所作的一个报告，叙述郁达夫在日占时期流亡苏岛的生活及战事结束之日突遭杀害的经过。此文流传极广，是一篇重要文献，也是一篇感情丰富、文字优美的记叙散文。文中断言郁氏乃遭日宪所杀，现已得到日本学者铃木正夫的调查证实，而且找到了迄今仍健在的当年凶手，详情也向前些时在浙江富阳举行的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上披露了。

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

· 胡愈之

郁达夫先生，中国新文艺运动中的一个伟大作家，失踪以后已经整整一年了。郁先生在最后时期，住居在苏门答腊西部的一个小市镇里。自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廿九日晚间八时他离开了他的家以后，再没有人知道他的踪迹。我和郁先生的许多朋友，以及苏岛的华侨，用尽一切方法调查探访，毫无结果。大家都知道是凶多吉少。到了最近，棉兰的联军总部方面透露消息，才证实了郁先生于去年九月十七日遭日宪兵杀害。

这样看来，郁达夫先生是早已不在人间了。他已遭了日本法西斯的毒手了。对于中国文艺界，这是一个无可补救的损失，对于国内外郁先生的友好们，这是一个不堪忍受的打击。

我和达夫相识二十年。一九三二年，达夫和我，参加蔡元培宋庆龄两先生所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工作。后来杨杏佛先生遭暗杀，达夫被迫离开上海，以后我们就少见面的机会。直到抗战开始以后，我们才又在武汉晤面，我们一同在军委会政治部工作。随后，达夫和我相继来了新加坡，服务新闻界。新加坡沦陷前后，我们一同出走，一同过流亡生活，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我们时常在一起。关于达夫的生平事略及其在中国文艺界留下的业绩，并不须要我来介绍。

惟有他在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和失踪前后经过情形，我知道的比较亲切。我应当向国内外文艺界、新闻界同人及郁先生的亲戚朋友们，作一个详细的报告。这是我对亡友应有的责任。只是因为郁先生被害的消息始终未经证实，因此我把这一件早应当做的工作，拖延下来，直到一年以后的今日，才写成这一个报告。对于各方面急于想获得郁先生消息的一些朋友，我感到无限抱歉。

一 从围城中出走

太平洋战争爆发时，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担任星洲日报编辑，兼任英政府情报部所发刊的《华侨周报》的主编。战事发生后，新加坡文化界组织了文化界战时工作团，并创办了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我和郁先生一同参加工作。郁先生担任文化界工作团主席和训练班的主任。一九四二年一月初，陈嘉庚先生领导的新加坡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成立后，我担任宣传部工作，郁先生任动员委员会的执行委员，兼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由于工作的关系，这时期达夫和我几乎是天天见面的。

英国政府急来抱佛脚，虽然允许动员华侨抗日，但已经太迟了。英海军太平洋舰队，在开战的一星期内就遭覆灭。守卫马来亚的英印军队节节败退。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底，日军已攻抵柔佛的新山桥头，和新加坡只隔一条狭窄的柔佛海峡，新加坡军港和市心区都在敌人炮火射程中。再加上敌空军狂炸马六甲海峡的船隻和沿岸的码头仓库，新加坡被包围得铁桶似的，英军虽然还作反攻的空口宣传，人们心头却都在估计着最恶劣的局势会立即到来。

在这最紧张的几天中，华侨抗敌动员委员会主席陈嘉庚先生曾经向新加坡总督汤麦斯提出交涉，要求新加坡万一撤退时，应给予抗委会工作人员安全撤退的便利。可是汤麦斯

总督答覆不能负责。而同时据英政府方面所泄露，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机关向英国交涉，也只要求英军保护中国领事馆人员及郑介民领导的军事代表团安全撤退，对于华侨抗日领袖及民众的撤退问题，则一字不提。

陈嘉庚先生对于这事势，感觉愤懑和失望。他就决定和抗委会一部份负责人员，雇了小艇，冒险撤退到安全地区。陈先生是一九四二年二月三日离开新加坡。后来在苏门答腊登陆，再由苏岛流亡到爪哇，避匿在泗水附近的一个小地方，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陈嘉庚先生离开新加坡那天，参加抗委会工作的一些文化界朋友，开会商议，大家认为英国既没有死守新加坡的决心，留在围城中，白白牺牲，毫无意义。所以决定雇小船渡海，撤退到苏门答腊，再作打算。小船是由刘武丹先生预先设法雇定，留给文化界撤退用的。这一次撤退的人员除我和达夫之外，有抗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唐伯涛和邵宗汉先生，宣传工作人员王任叔，张楚琨，王纪元，汪金丁，郑楚云，蔡高岗，刘道南，高云览，陈仲达，刘岩诸先生以及李振殿，李铁民先生等。撤退以后，宣传部工作移交华侨抗日义勇军和文化界战时工作团抗日宣传队办理。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的，就是当时一部分文化界朋友，向中国领事馆办理回国护照时，领事馆方面说是奉中央命令，对某些“文化人”，不准发给护照。据说我的名字也在内。为了这事，我曾经向总领事高凌百，海外部代表叶公超交涉，请其向中央问个明白，是不是已经把我们的国籍开除，不然，断没有对一个中国人停发回国护照的理由。后来领事馆有没有去电向中央请示，我不知道。不过，我们的回国护照是由领事馆送来了。有了护照以后，去苏门答腊还得经过荷兰领事馆签证。荷印政府当时拒绝除了妇孺之外的任何难民入境。因此新加坡的荷兰领事馆拒绝签证。但是我们决定不管，到了苏门答腊登岸时再办交涉。

一九四二年二月四日清晨，我们的难民船（一隻破旧的小电船）载着二十八个男女老少难民，悄悄地从新加坡开行了。达夫和我各人只带了两个手提箱。达夫在一星期前已把他的儿子郁飞托朋友带回国去。剩下在新加坡的一屋子书籍也送给了朋友。当我们的船正驶出新加坡港口时，敌人大编队的轰炸机已经袭来，隐约听到新加坡市内响着警报。接着是一片爆炸声。当时有一架敌机，掠过我们头上。但因为我们的船太小了，侥幸没有成为敌机的目标。一小时以后，遥望新加坡，只见三缕浓烟向天空直冒。我们算是离开危险区域了。大家默然无言，心中却在默念着：“别矣新加坡，什么时候才和你再见呢？”

二 原始森林中的生活

当天傍晚，当难民船驶抵离新加坡最近的一个荷属小岛巴美吉里汶时，岛上荷兰官员竟误当作是日军的登陆艇，向我们开枪示威。一场误会消释后，我们当被允许登陆。但因为大多数都是没有取得合法入境手续，所以在那岛上被扣留了两天，到二月六日晚间，才驶抵另一个小岛石叻班让。刘武丹先生一家和兹九等已先一天在那边等候我们。在那边休息了一晚，大家商量此后的行动方向。后来决定，我们七人首先出发，经苏门答腊大陆，再设法去爪哇。这七个人，除了我和达夫之外，是唐伯涛，王纪元，邵宗汉，沈兹九，张绿漪。当时我们估计，新加坡虽不能守，联军撤退到爪哇，至少应当可以坚守数月。我们打算先去爪哇，再看形势，如果在爪哇能找到船，或者还有回国的可能。

石叻班让是一个小岛。我们要求去爪哇，岛上的荷兰官做不得主，所以把我们送到另一海岛——望嘉丽——那边。二月九日我们到了望嘉丽，由当地商会会长吴先生招待，住在华商俱乐部。我们去见了当地荷兰分州长，要求准许我们

去爪哇。分州长说要打电报向巴城（荷印首都）请示，就把我们一群人的履历抄了去，以后我们每天去催问有无回电，总是说回电还未到。直到了第五天，荷兰官说回电来了，政府不答应我们去爪哇，只好暂留在岛上。本来，荷兰政府对华侨文化界人士入境，限制极严，现在中国与荷兰已经是同盟国了，而且我们是难民，但荷兰政府依然不让我们行动自由。后来听说陈嘉庚先生经过苏门答腊，也遭荷兰人留难。荷兰政府对我们华侨这种德政，是我们所不能忘记的。

但是唐伯涛先生在新加坡已获得荷兰领事签证，所以荷兰官对他特别通融，准许前进。于是他一个人出发，由苏门答腊内地，转巴东港，搭了英国军舰经印度回国了。剩下我们六个人，留在望嘉丽，欲进不得，欲退不能，又是气愤，又是焦急。每天只是听着从马六甲海峡对岸传来的炮声，这炮声是一天比一天紧了。每晚则从无线电收音机，听着各方面的战讯，消息一天比一天更不利。到了二月十五日傍晚以后，海峡对岸的炮声忽然静寂了。我们知道事情不妙，到了深夜，我们再听爪哇方面联军电台广播，宣布新加坡失守，英军司令柏斯华中将已向日军投降，这一晚大家忧急得不能入睡。新加坡既已失守，离我们所在地只有一水之隔，敌人随时可以在这小岛登陆。我们不能再逗留在这危险区域了。我们只好再去见荷兰分州长。那分州长正在慌张着整理行装，准备逃跑，见了我们就说：“现在你们的行动不再受限制了。你们随便去那里都可以。”

这句话把我们气得要死。因为数日前到苏岛内地还有汽船，荷兰人不放我们走，现在一切交通工具都被荷兰人扣留了，有什么方法向前走？而且走到那里去呢？

幸而有一位陈仲培先生，是热心的当地华侨，他住在望嘉丽对岸一个名叫“保东”的小村子里。他是一家电船公司经理，有一只电船往来于保东和望嘉丽之间。前几天，他来看我们，说我们没有地方去，可以到他家暂避风头。

这时候，我们想不出有什么别的地方可去，就决定当天搭电船去保东村，看那边的情形再作计较。

二月十六日傍晚，我们到了保东村了。陈仲培先生一家人十分殷勤地招待我们。我们在他家隔壁租屋住下来。这个保东村是一个未开辟的荒村，前面是一条小河，十分幽静。全村只有二三家华侨，此外都是印尼人。在那边，我们住了约一个半月。开始学印尼语。达夫每天写一首诗。他所存乱离杂诗十一首，大半是在那村子里写的。

在保东的时候，我们对战局还抱乐观。我们以为联军撤退到爪哇之后，可能增援反攻，至少在爪哇支持数月是不成问题的。所以我们打算找一条安全的路，走到爪哇，再搭船渡印度洋回国。不然在爪哇帮助当地华侨做些抗敌工作也好。因此我们托人到处打听，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船去爪哇。可是到了三月九日，我们这最后的一线希望也断绝了。那天晚上，我们从收音机听到爪哇荷印总督向日军投降的消息。爪哇既已沦陷，我们再没有走到安全地带的路了。在这时候，保东村附近一带风声紧急，日军早晚要来接管附近小岛。我们六个外来的人住在陈仲培先生家中，对他很不方便。我们不能不做长期隐蔽的打算。商量了几天之后，决定把我们六个人分成两批，找两处冷僻地方改换姓名职业，隐匿下来。过了几天，达夫和纪元两人第一批出发找到了一个地方，离保东村十许里远一个海边的小村，名作彭鹤岭。当地有一位热心华侨寇文成先生帮忙他们，临时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从寇先生店中挪了一些货色放在店面，作为掩护。达夫改名赵德清，做小店的头家，纪元改名汪国材，是他的夥计。那个小村庄只有数十家人家，周围是未开辟的森林，当地物价还算低廉。他们两人把剩下来的数百元逃难费，拨出一部分预先买了米收藏起来，准备过长期的隐蔽生活。过了几天我和兹九，绿漪，宗汉，作为第二批迁移到巴唐岛（P. Padang）沿海的一个“木廊”（即森林采伐工场）里。那地方只有一家木廊，

是陈仲培先生经营的，除了六七个伐木苦力工之外，没有人迹。整个岛上是高可参天的原始森林，只有猿猴和山猪麋鹿出没其间。虽然是个荒岛，但为避免敌人追踪，这里算是最安全的。所以我们四人决定长期住下来，除预先买了些粮食外，还打算自己种菜捕鱼，解决生活。这地方和彭鹤岭只有一水之隔，遇顺潮时只要两点钟可以划小船到对岸。但为了怕发生枝节，我们和达夫纪元都不敢时常往来。

三 进入苏门答腊内地

我们虽然在人迹未到的森林地带分别隐匿起来，但和附近小岛上一些难民朋友，仍然保持联络。大家用小艇来往，传递消息。这时从新加坡陆续流亡到附近一带小岛上的难民，大约有一二百人。其中一部份是侨领和富商，另一部份是教育界新闻界人士，都是因为不愿和敌人合作，从新加坡炮火中逃出来的。这些小岛上华侨人口寥寥可数，骤然增加了一二百个难民，不免闹的沸沸扬扬。后来连昭南岛日本宪兵部也知道了，因此我们就不能再安心住下去。

在一九四二年四月间，昭南市政府派了李玉英、王铁汉两人来石叻班让，住林建达先生宅中。这两个人，据说是奉日宪兵部命令来“邀请”一些侨领回昭南岛去的。被邀请的名单，列有十余位福建侨领，第一名是陈嘉庚先生，此外是李振殿，刘武丹，黄奕欢，周献瑞，颜世芳，林庆年，林谋盛，王吉士，唐伯涛，周炳炎先生等。陈嘉庚先生等是从另一条路线到苏门答腊的，所以找寻不到，但其余许多位侨领的住址，却都被发现了。于是其中李振殿，刘武丹，周炳炎，颜世芳等四位先生，都被送到昭南岛。据刘武丹先生后来亲自告诉我，他们四个人，到了昭南岛，就被拘禁在中央警察署，遭宪兵刑审毒打，在狱中吃了四十天的苦，才由伪华侨协会担保释出。

当昭南岛派来的人员到了石叻班让的时候，我和教育界

新闻界的一群难民朋友，就在德洛对岸的一个板廊内举行了一次紧急会议，参加者二十余人。当时大家的意见，以为昭南岛第一批“邀请”的虽然是些有钱的侨领，但是那两个派来的人员知道另有一批教育界新闻界人士隐匿在附近一带，回去报告，日后一定会被牵连，这些小岛现在已经不是安全地了，至少达夫和我过去参加领导新加坡文化界抗日工作，为敌人所注目，一定非离开这附近不可。要是我们两人住在附近一带，其他难民朋友是都会受累的。

既然是大家的公意，我们是非离开不可了，但离开这些小岛，要去哪里呢？当时方君壮先生提议买一条舢舨船，漂流去印度，但大家都觉得这没有把握。到最后决定，还是向苏门答腊大陆上走。从这些小岛溯沙志河(Soengai Siak)而上，在卜干峇鲁(Pakan Baroe)登岸，可达苏门答腊西部。在那边没有什么熟人，就不至被敌人追踪了。

会议以后，我到彭鹤岭，把大家的意见告诉了达夫和纪元，达夫最初是犹豫着。因为我们是浙江人，不会说厦门话，印尼话学习得又不久。苏岛西海岸一带，大部份是侨生，国语不大通行。我们冒险前往，困难是很多的。可是这时候，附近一带到处有谣言，说是昭南岛要继续派人来搜索。我住在陈仲培先生的板廊里，他也劝我们三十六着走为上着，于是我们才决定了。我们六个人仍分两批，去卜干峇鲁。达夫和纪元是第一批，我和宗汉，兹九，绿漪是第二批。船是陈仲培先生代雇的。约定达夫纪元先去卜干峇鲁。我们第二批，因为有女眷，暂在离卜干峇鲁二十馀公里末旦地方的木廊内住下，等待第一批平安到达后来信通知，再行前进。我们又约定大家重行换过一个姓名，达夫改名赵廉，我改名金子仙，我们都以商人姿态出现。无论如何，进了苏岛大陆以后，再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真姓名了。

达夫和纪元出发后，纪元在中途病了，就在一个小镇上留下来，过了约两星期方继续前进，所以达夫是一个人跟着

一位不相识的商人坐了小船去的。我们则在末旦住了一个半月，接到纪元的信以后，才雇船去卜干峇鲁，在卜干峇鲁住了五天，再坐公共汽车去巴爷公务。到巴爷公务已经是一九四二年六月二日。达夫比我们先一个半月到了那里。我和兹九母女，在近郊曾和尚先生的椰树园中住下来，到一九四四年二月底才离开去棉兰。

四 在巴爷公务

巴爷公务(Pajakoeu Boeh)这个地名，在普通地图上是不容易找到的。这是苏门答腊西部高原的一个小市镇，处在巴东(Padong)东北一百八十八公里，离武吉丁宜(Boekit Tinggi亦名花的国)三十三公里。以巴爷公务为起点，有一条铁路，经武吉丁宜，通至巴东。巴爷公务市镇上人口约万馀，其中华侨约一千馀。华侨以侨生居大多数，大部份操印尼语或闽南语，镇上只有一间中华小学校。

郁达夫先生到巴爷公务的时候，原定计划，想找当地华侨帮忙，租一屋子住下去，设法做些小生意，把自己隐蔽起来。谁知一到那地方，就有人怀疑他是日本间谍，不敢招待。本来是人地生疏的，再加上当地华侨怀疑他是间谍，因此他只好到处碰钉子，连居屋问题都无法解决，更不用说找职业了。

为什么当地华侨怀疑他是日本间谍呢？说起来是非常可笑的。原来当郁先生从卜干峇鲁搭公共汽车去巴爷公务时，那汽车的司机和搭客全都是印尼人。中国人只有他一个，他怕路上遭抢劫，穿了一身蓝布的工人服装，像一个苦力模样，又不会说马来话，所以车上印尼人瞧不起他。谁知那公共汽车开到中途，迎面来了一辆日本军车。那军车上的军官做着手势，命令公共汽车停下来，一面说着日本话。车中的印尼人没有一个懂日本话，不知是说什么，以为日本人要占用他

们的汽车，慌的了不得。司机和搭客下了车，纷纷逃跑。达夫懂得日本军官的话。他知道日本军官不过是问去卜干峇鲁的路程，别无恶意。他就用日本话答覆了那军官。日军初到苏岛，当地懂日本话的非常少。那军官骤然听到达夫讲一口流利的日本话，非常高兴，却并不怀疑，就向达夫道了谢，举手行了一个敬礼，车就开走了。

这一场风波平静之后，车上的印尼人都大为吃惊。他们以为这个苦力装束的华侨，竟会说日本话，而且日本军官还向他行礼，一定是一个日本间谍伪装的了。因此当车开到了巴爷公务，印尼司机送达夫进一家广东人所开的海天旅馆住下时，司机把这人来历偷偷地告诉了旅馆主人。不到一二小时，巴爷公务的华侨，传遍了一个惊人消息：日本大间谍来到巴爷公务，调查当地华侨动静。这位日本间谍，冒充作中国人，名叫赵廉，住在海天旅馆。因此，达夫到了巴爷公务之后，弄得一无办法，每次他走到街上，凡是中国人就远远地躲开，不敢和他接近。他去访问了当地侨领和同乡，大家对他都是敬鬼神而远之。达夫自己还不明白当地华侨为什么对他这样冷淡，他不明白自己被人误会作日本间谍，而以为是巴爷公务的华侨，缺少同情心，不肯帮忙一个从外路来的孤客。

这时巴爷公务还没有驻扎日本兵，只有距巴爷公务三十餘公里的武吉丁宜，才有日人机关和宪兵队部。说起来真是不巧的很，有一天，达夫去访当地的侨长（荷兰时代的甲必丹）蔡承达先生，托他代找一个屋子。进门的时候，正有一个日本宪兵在那里向他办交涉。双方语言不通。侨长已经知道达夫懂日本话，就要他做临时翻译。这一来，武吉丁宜宪兵部就知道了有一个华侨赵廉，住在巴爷公务，精通日语。但宪兵只知道他是苏门答腊商人，幼年跟父亲在东京长大，所以学会日语，并不怀疑他有什么。

可是不久麻烦就来了。当时苏岛日军十分需要通日语的